

张建业 主编

李贽全集注

十石齋

第二十一册 四书评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张建业 主编

李贽全集注

牛鸿恩

【第二十一册】
四书评注

牛鸿恩 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贽全集注·四书评注/牛鸿恩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97-1183-5

I. ①李… II. ①牛… III. ①李贽 (1527 ~ 1602) —全集—注释 ②四书评—注释 IV. ①B248. 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231 号

李贽全集注 (第二十一册) · 四书评注

主 编 / 张建业

注 者 / 牛鸿恩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黄 丹

责任校对 / 孔 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4.5

字 数 / 58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183-5

定 价 / 7900.00 元 (共二十六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四书评·序^[1]

千古善读书者，陶渊明一人而已^[2]。何也？以其“好读书不求甚解”也^[3]。夫读书解可也，即甚解亦无可求者，只不可求耳。盖道理有正言之不解^[4]，反言之而解者；有详言之不解，略言之而解者。世之龙头讲章之所以可恨者^[5]，正为讲之详，讲之尽耳。此《四书评》一帙^[6]，有正言，亦有反言；有详言，亦有略言，总“不求甚解”之语则近之。若读者或以为未解也，则有世之所谓龙头讲章在。勿谓李卓老解之不详，讲之不尽，令渊明老子笑人也。

卓吾自述

注释

[1]《四书评》：明万历间刊本，含《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十卷，《孟子》七卷，凡十九卷。前有《四书评·序》，落款为“卓吾自述”。明末盛于斯说：“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皆叶文通笔也。”（《休庵影语〈西游记〉误》）同时人周亮工《书影》也有相同的说法。为《续焚书》作序的焦竑、张鼎、汪本钶都一致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贗书并传于天下”，“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续焚书》卷首）。汪为李贽弟子，对李贽著作“收拾无遗”，而《续焚书》却未收《四书评》的“卓吾自述”。张岱年、容肇祖等认为非李贽所著，侯外庐仍定为李贽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李贽反孔著作。此后，或说出于李贽，或说不是，争辩双方，各举所见，相持不下，至今无定论。

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之际张岱《四书遇》，其中引“李卓吾曰”17次，“李宏甫曰”1次，“《四书评》曰”1次。所引“《四书评》曰”的话不见于今所印万历本，其余18条与万历本《四书评》全同或基本相同者11条，有同有异者2条，万历本无或全不同者5条。由此可以说明：①张岱所引仅一条《四书评》却不见于今本，其余说是“李卓吾”、“李宏甫”，则张岱是否把《四书评》视为李贽著作，似仍不能无疑问；②张岱所引19条与今传万历本约十之三四不相同。张岱之死（1679）上

距李贽之死（1602）七十余年，说明其间又有变化。《四书遇》所引19条还没有引起《四书评》研究者注意，它似为侯外庐说增加了论据。同意侯说者，还指出盛于斯、周亮工所提到的《续藏书》是李贽所著，《水浒》确为李贽批点，《四书眼》是叶昼（字文通）所编其师杨起元（号复所）的著作，叶氏有明说。可见盛于斯等人之说并不可信。而且，万历十六年（1588）李贽写给焦竑的信说：“年来有书三种（《焚》、《说》、《藏》——引者）……得数年未死，将《语》、《孟》逐节发明，亦快人也。”（《焚书》卷一《答焦漪园》）万历十九年（1591）底（一说万历二十六年，则为1598），给焦竑的信又说：“《焚书》五册、《说书》二册……外《坡仙集》四册、批点《孟子》一册，并往请教。”（《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孟子》在《四书评》最后，似此时李贽已完成《四书》的批点。我们认为，从《四书评》所体现的思想倾向看，其与李贽的思想有一致之处，同时存在更多的、不易解释的疑问。

先说前者。第一，《四书评》中绝大多数的评语都是顺着孔、孟的话说，“发明”经文，颂扬孔、孟，如：“千古至言”，“千古只眼”，“万古经纶”，“真学问，真经济”，“救世苦心”，“真天地父母之心”，“圣人自有圣人之手，圣人自有圣人之眼”，“此等文字，都有关于国是，天下万世所赖也”，“圣人文字真能醒醉觉梦”，“非圣笔安得有此”，“记《论语》者，圣手也”，“天地间有如此文字，曰识，曰才，曰胆，都有”，“《孟子》全部固文之圣也”，“孟子，大圣人也”。可以说，全书充满对孔、孟的“推崇备至之词”（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四书评》）。这与李贽早、中期著作如《童心说》尖锐对立，而与晚年著作《道古录》一书对孔子的颂扬则彼此呼应。从文章的角度而言，则赞美说：“绝妙文章”，“绝世奇文”，“字字活眼，的是圣笔”，“又委婉，又直截，圣人之言”，“如此机锋，如此描画，千古无两”，“圣贤言语，可谓滴水不漏，心服，心服”，也表现了由衷的钦佩。第二，评语又不迷信孔、孟，还有批评和少量讥讽，如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评曰：“这是孔子真话，亦把自家心体和盘托出矣。”（《子罕》）不认为是孔子自谦。“与大众亦只一样，所以为圣人。”（《乡党》评语）“‘至圣’、‘至诚’，吾性之名号耳，非他人也。若以‘至圣’、‘至诚’为他人，便是衣珠行乞，却不辜负了天命？”“要到‘至圣’、‘至诚’地步，亦只在‘戒慎’、‘恐惧’处起脚。”（《中庸》第三十一章评语）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评曰：“夫子婆心直至此地，极象如今急功名者，欲得一好梦也不能……”（《子罕》）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评曰：“却又‘微服而过宋’。妙，妙！”（《述而》）这是比较尖锐的讥讽了。不过这样的评语绝无仅有，像“‘惟酒无量，不及乱。’大圣人也！大圣人也！其余都与大众一般”（《乡党》），“酒色财气，孔子之训，止戒其三。固知无量之圣，不知酒之当戒也”（《季氏》）也是讽，但是谑而不虐（加上下文所引“必欲没世称名，也是个‘疾’”，即《四书评》对《论语》的全部批评）。除了这少数讥讽之语，其余与《道古录》的评论、尊崇孔子是一致的。对孟子的批评较多，多处涉及内容，

如“此处议论不甚妥”，“恐此处议论，未足千古”，批评孟子与淳于髡的辩论“竟是相骂一场”（《告子下》）。还有时从保守的立场批孟，说见下文。对孟子文章的批评，如“末二节蛇足”，“二‘弗’字太着意，二‘而’字太着迹”，多处说“太形容”。不具引。第三，《四书评》对《大学》、《中庸》没有一句批评，说《大学》“字字精神，句句警策，最为吃紧，最为详明。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故知《大学》一书，平天下之底本也”（《大学》末章评）。《中庸》第三十章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评语说是“字字赞天地，实是字字赞仲尼，此赞体之最有味者也，绝世奇文，都在圣贤口里”。李贽在《圣教小引》中说：“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乃复研究《学》、《庸》要旨，知其宗贯，集为《道古》一录。”（《续焚书》卷二）彼此对照，二者是一致的。第四，《大学》的评语又说：“然理财又在用人……末后五节，总把用人、理财合说一番。……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这个“尝论”值得注意，李贽在《藏书·富国名臣总论》说：“夷吾（管仲）之于齐，商君之于秦也，言听而计从之矣。然夷吾之行，迨二百余年以至威、宣，犹享其利。商君相秦，不过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强，成帝业者。”文中还赞桑弘羊“既有心计，又善用人”。《藏书·富国名臣·刘晏传》也说，刘晏所置诸道租庸使“皆慎简台阁士以充之……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李贽评：“大见识”）。彼此对照，二者一致，“尝论”当是指《富国名臣》所论，不然便是有意作伪了。又《藏书·德业儒臣·孟轲》附《乐克论》结尾说：“然则乐克亦可人哉！”《离娄上》写乐克一章的评语说：“乐正子的是可人。”似乎也是彼此呼应。第五，评语常引用孔、孟批评当时士人、儒者和道学；又常引用佛家、道家思想批评或解释孔、孟，如“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评曰：“必欲没世称名，也是个‘疾’。”（《卫灵公》）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评曰：“说因果。曰‘吾今而后’，是豁然大悟语。”（《尽心下》）孟子曰：“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评曰：“‘修身见于世’，固知非自了汉已也。”（《尽心上》）第六，评语常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程朱、“宋人”，屡屡嘲讽朱熹的解说。所有这些，和李贽的思想倾向或其他著作都是符合的。

再说后者。联系李贽著作，彼此扞格，不可理解者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第一，如上所说，《童心说》以为《语》、《孟》是“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也”（《焚书》卷三）。与上面所引“的是圣笔”，“非圣笔安得有此”，“记《论语》者，圣手也。读《论语》者，从来都是瞎子”，及“千古至言”、“万古经纶”、“天下万世之所赖”云云，彼此大相径庭，使人无法相信同出一人之手、之口。有人考证，“李贽在万历十九年十二月给焦竑写信时，刚刚批点完《孟子》”。“童心”一词来自《孟子》“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认为《童心说》写于“万历二十年三、四月间”（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

史》第274、275页)。这就是说,如果今所传《四书评》为李贽所著,那么《四书评》与《童心说》的写作在同一个时期。这就更加难以理解。李贽的思想是有矛盾、有发展的,不同时期说彼此矛盾的话,在不同情况下说不同的话,完全可能。李贽十二岁写《老农老圃论》,表彰樊迟,讽刺孔子。《论语·子路》该章的批语却说:“(樊迟)乃学稼、圃,真是小人。”对此,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同一个时期,对《论语》、《孟子》的态度、评价截然相反,这该怎样解释?第二,《藏书·德业儒臣·孟轲》贬抑孟子,对孟子作了多方面的批评:①孟子门派观念太重,“尽排众说”,执一而害道。但《四书评》对孟子的“尽排众说”和“执一”,却完全不表异议,孟子大骂:“杨氏……墨氏……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评语则说:“(孟子)也只是把自家一片苦心,呈出与人看耳,不作诳语。○杨、墨之乱,在言语上,故老孟治之亦以言。”(《滕文公下》)孟子把杨、墨比作“放豚”,评语说因为“豚极蠢,故以之骂杨、墨”(《尽心下》)。孟子说兵家应当“服上刑”、纵横家“次之”、法家“次之”,评语说:“断得服人。”(《离娄上》)孟子说“辟土地”的法家和“约与国”的纵横家是民贼,批语说:“骂得快活。”(《告子下》)这与李贽一贯的主张、观点完全不同。在《藏书》中,商鞅、韩非为强主名臣,张仪、苏秦为智谋名臣,孙武、孙臆为《武臣传·大将》。李贽晚年有《孙子参同》之作,称文和武为左右手。②孟子说孔子“贤于尧舜”是“过情”,说“生民未有”是“言之过”,是弟子“神圣其师”。这些颂孔之语,出于《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宰我说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有若、孟子说了三次“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并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而《四书评》则说:“此篇于学问宗旨大有关系,非仅仅问答之常已也。○文字亦奇。”与《藏书》的旨趣(包括不“学步”、不“践迹”)完全二致。与李贽《答耿中丞》斥孟子“愿学孔子”为“非夫”(《焚书》卷一),更是抵触。而《四书评》却反问:“谁说孟子愿学孔子也?”(《公孙丑上》第四章)很像是反驳李贽。③孟子王霸之辩,“舛谬不通甚矣”,五霸何以得罪于三王,“正有功于三王者矣”,“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实心服管仲之功也”。《四书评》对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却说:“说得直恁快人。○可谓平允矣。”与《藏书》完全不同。《孟子·公孙丑上》写有人问曾西:“吾子与子路孰贤?”“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眉批:“玩‘然则’二字,或人亦知管仲不及子路也。”尾批:“国势民情,如视之掌,故敢卑言管、晏。”认为管仲不及子路,同意孟子鄙视管仲,这不仅违背孔子之意,更不是李贽的观点。④《藏书·德业儒臣·荀卿》反对“抑荀而扬孟轲”,反对孟子尊孔子的方式,说“学步”、“践迹”为“婴儿之类”(《孟轲》),所以故意把荀子排在孟子前,说:“故曰荀、孟,吁,得之矣。”抑孟的倾向十分鲜明。而《四书评》对孟子却诚心诚意地赞扬:“孟子,大圣人也!”“大圣人!”“心服,心服!”“天地间有如此文字,曰识,曰才,曰胆,都有。”“真正天地父母之心!”“天下万世之所赖也。”这样的赞扬,与《德业儒臣》的贬抑实在无法统一。还须指出,以上两点应当是最具特色的李贽思想,

可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四书评》对于这两点毫无体现。第三,在《道古录·引》中李贽以为自己是陈、王门庭之内的“的统子孙”,《续藏书》卷一四《王文成公》的“李贽曰”对“阳明先生”尊敬之情溢于言表,“先生”不离口,赞为“足继孔圣之统”。对王阳明弟子门徒,李贽也给予高度评价,如颂王畿曰:“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先生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焚书》卷三《王龙溪先生告文》、《龙溪先生文录抄·序》)而《四书评》却直呼“王阳明”,甚至竟然借孔子之语批评讲“心学”、言“良知”者:“‘致知’必在‘格物’,‘尽性’必在‘穷理’,孔子已身验之矣。彼讲心学者何如?”(《卫灵公》第三十一章“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评语)“‘天命之谓性’,‘大人’尽‘性’之人,‘圣人’之言,尽‘性’之方。今之讲心学者,畏耶?狎耶?侮耶?自考之。”(《季氏》第八章“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评语)“呜呼!今天下蔽者岂少哉?言‘良知’而不言‘学’,亦愚,亦荡,亦贼,亦绞,亦乱,亦狂。”(《阳货》第八章评语,此章记孔子曰:好仁、知、信、直、勇、刚而不好学,其蔽也愚、荡、贼、绞、乱、狂)一书之中,三致意焉。自王阳明起,即有忽略客观知识的倾向,而且标榜“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的“狂者胸次”(《传习录》下)。“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弟子徒属更有狂肆废学者,倡导不学不虑,以为认知识为良知,则知识有害。而李贽以狂狷自居(《藏书·德业儒臣·孟轲》所附《乐克论》),自称“其心狂痴,其行率易”(《焚书》卷三《自赞》),又以为常人童心之失,源于多读书所得道理闻见(《焚书》卷三《童心说》),都与阳明学派一致。但是,《四书评》却尖锐抨击“讲心学者”反孔子之道而行之,是三不畏的小人,特别是“不言‘学’”,而至于愚、荡、贼、绞、乱、狂,已是“天下蔽”。这显然是对王阳明及其门徒的严厉批评。李贽自己就说:“禽兽虽殊类,然亦有良知,亦有良能,亦知贪生,亦知畏死……”(《道古录》卷下第二十四章),自己明明讲“良知”、讲“良能”,属于心学一派(李贽对陆九渊充满敬意,许之为“德业儒臣”,而对朱熹多所批评,称之为“经学儒臣”)。他怎么又斥责起“彼讲心学者”、“言‘良知’”者,斥责不言“学”者呢?这样的言论,出于李贽,真让人难以置信。第四,孟子颇有一些大胆的言论。如“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评语曰:“全亏‘膏泽下于民’……不然几不成话矣。”(《离娄下》第三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评语曰:“穷秀才气。”(《尽心下》)面对孟子的这类大胆言论,李贽退缩了?一味承顺统治者的意旨?果真如此,当然让人很丧气。又如鲁穆公很尊敬子思,屡次请教,又总以君命馈鼎肉,弄得子思总要磕头拜受,最后子思大发雷霆,把送鼎肉的使者逐出门外,拒绝接受。子思对鲁穆公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

友？”孟子议论说：“天子不招师……吾未闻欲见贤而招之也。”（《万章下》第六章、第七章）对于这类事件和言论，评者只评文章，不谈思想，明显表现出保守立场，与孟子相比，大为逊色。当然，孟子在明代是一个敏感话题。洪武五年，就因为孟子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不尊君的话，引起朱元璋愤怒，一度把孟子的牌位扔出孔庙。洪武二十七年，又删除《孟子》中有碍尊君的言论，而成《孟子节文》。此事下距李贽潜心著述之时，将近二百年，“快口直肠，目空一世”（焦竑），“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袁中道）的李贽，仍然心有余悸，唯唯诺诺？第五，《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主张实行井田制，评语曰：“真学问，真经济。先在滕国做起，亦买田一区之意也。”给以高度评价，对宋代张载“买田”作井田实验也给予肯定。而李贽《兵食论》以为井田制是黄老之术、“轩辕氏之政”，对孟子之说，不仅没有一句肯定之词，反而批评道：“文事武备，一齐具举，又何待庠序之设，孝弟之申，如孟氏画蛇添足之云乎？”又说：“张子厚复欲买田一方，自谓井田。则又不知井田为何事，而徒慕古以为名，只益丑焉。”（《焚书》卷三）两种俨然不同的评价，怎么会同出一人之手呢？第六，评语一再批评孟子“太英气”，“露英气”，“露圭角”。其实这都是程子批孟子的话。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引程子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以孔子之言比之……如冰与水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这是说，孔子之言如玉，温润含蓄。孟子之言有光耀，却是冰与水晶。李贽对程颐、朱熹很反感，《藏书》卷四三《经学儒臣·程颐》斥程颐“真不成话”、“益不成话”、“胡说甚”，他的书中批朱熹之处更多，他虽然批评孟子，难道又一再拾程朱牙慧，这种可能性恐怕不大吧？第七，读《四书评》，与读李贽其他著作给人的感觉不同。李贽思想开阔，文章风格尖锐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据胸中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读之者高其识，钦其才，畏其笔。”（袁中道《李温陵传》）老实说，读《四书评》没有这种感觉，评者的思路似不够开阔，读者感觉不出他有过人的才、识，没有李贽著作那种不可羁勒和滔滔滚滚的气势。文体不同，自然不可等量齐观，但是命意、文风不应相差太远，甚至相反。《论语·先进》“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旁批：“画。”尾批：“极善模写。”评者对此实际无话可说，以“善模写”敷衍了事。李贽曾说，他要将“《语》、《孟》逐节发明”，这样的评语算什么“发明”？“发明”了什么？反观《藏书》的《乐克论》由“善人”、“不践迹”，洋洋洒洒写出一篇鸿文，观点、文风，都不相同。又如《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评语曰：“‘赤子之心’正是道心，正是性，小人那得知？”李贽《童心说》源于“赤子之心”，他在这里说这么两句，就没词儿了？上述《兵食论》，就是阐发井田制，在这里他对井田制颂扬这么两句，就完事了？又如《论语·乡党》写孔子“素衣麕裘，黄衣狐裘”等等，评语曰：“处处停当。”而《道古录》卷上第九章全章对此大发议论：“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陶朱、猗顿辈，亦天与之以富贵之资

也。……富之不可求明矣……求而得者，亦天也，亦命也。”又如《中庸》第七章引孔子说：“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评语仅一个字：“病。”是说不知辟、不能守是“病”。可是在《道古录》中，李贽说：“夫中庸何物也？择而守之则生，不知择而守之则遂自纳于死，岂非谬与！今之不知中庸者众矣，何以不入于阱也？……因书之以请教四方之讲道学者。”（卷下第五章）《道古录》表现的才是李贽的真面目。又如《离娄下》孟子曰：“尧舜与人同耳。”旁批：“未必。”这也不可能是李贽的文风、李贽的思想。此外，与《四书遇》所引杨复所的评语相比，颇多雷同、近似，叶昼说：“先师与李卓吾不同道而亟称卓吾……故其论次批评间多暗合”，“此书与《四书评》同者，已尽情删削”（叶昼代杨复所所编《四书眼·凡例》，转引自刘建国《也谈李贽〈四书评〉的真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虽然“尽情删削”，而对比《四书评》和张岱《四书遇》所引杨复所语，雷同者仍旧存在，如《论语·子罕》第二十四章“法语之言”、“巽与之言”的批语语句即大同。“亟称卓吾”，“批评间”就“多暗合”？这也是一个不解之谜。明代书籍市场繁荣，冒名出书或改窜伪造的商业化风气很浓，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可以肯定，与李贽思想、言论不一致的，实在不少。

当然，人的思想是有发展的。把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言论简单对比，难以作出合于实际的结论。李贽在《圣教小引》一文谈过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以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五十以后……乃复研穷《学》、《庸》要旨，知其宗贯……复有六十四卦《易因》镌刻于世。呜呼！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不吠声矣。向作矮子至老遂为长人矣。”李贽“至老”而“自谓知圣”矣（《续焚书》卷二）。万历二十二（1594）或二十三年（1595）冬，李贽风尘仆仆直走黄安，与十余年的老对头耿定向握手言和，“语甚欢契”，自称二人“志同道合”（《焚书》卷四《耿楚侗先生传》）。此前，李贽就“梦见与侗老聚，颜甚欢悦”，认为“冤讎可解不可结”（《焚书》卷二《与友山》）。这是一个老大不小的事件。无疑表明，李贽这时的思想有了变化。《道古录》的尊孔倾向，就是李贽晚年“知吾夫子”、思想有变之一证。《四库全书总目》评李贽最后一部著作《九正易因》说：“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惟此书尚不敢诋訾孔子，较它书为谨守绳墨云。”（卷七《易经存目一》）尽管如此，《道古录》有李贽一贯的思想风格，《四书评》则不同，如上所述，不同于李贽前后期思想之处甚多，如果它至迟写于万历十六年至十九年之间，其写作几乎与《藏书》同时，而《四书评》以尊孔孟为主，与《藏书》明显齟齬，就更不好解释。

所以，要作出《四书评》是否出于李贽之手的明确结论，应当慎重。一时作不出结论，不妨姑且存疑。焦竑在《续藏书·序》中说到“其实真贋相错，非尽出其手也”。我们在发现两方面证据同时存在时，也有《四书评》“真贋相错”的感觉，不同的是，“贋”的证据更多、更充分，感觉更突出，不出于其手的可能性应当更大。张岱

年、容肇祖先生的意见可能更可靠。当然，李贽明确说他有批点《孟子》，如果《四书评》全是赝品，那么他的《批点孟子》哪去了？那些“真”的证据莫非都是出于作伪？有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书，是朱熹祖述程颢、程颐的观点、做法，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使之与《论语》并列，称为“四书”。认为《大学》有“经”、有“传”，“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书》代表了孔子经曾子、子思到孟子的儒家道统。朱熹为《四书》分别作了注释，即《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后人合称《四书章句集注》或《四书集注》。朱熹自己称之为“《四子》”，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〇五《论旨注书》）元代以后《四书》和朱熹注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本书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据明万历刻本排印本为底本。

〔2〕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官江州祭酒、彭泽令等职，后归隐田园。长于描写田园风光，艺术特色平淡自然，有独特风格。著有《陶渊明集》。《晋书》卷九四、《宋书》卷九三有传。

〔3〕好读书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散文《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以五柳先生自况。甚解，指过分地或拘泥或牵强地解释。

〔4〕盖：大概，大约，推测原因之词。

〔5〕龙头讲章：为讲习科举文而编写的经书的讲义。龙头，状元的别称，这里泛指科举。

〔6〕一帙（zhì）：一函。帙，古代线装书的函套。

四书评注目录

四书评·序	(1)
大学	(1)
中庸	(22)
论语卷之一	(58)
学而第一	(58)
为政第二	(67)
论语卷之二	(77)
八佾第三	(77)
里仁第四	(88)
论语卷之三	(96)
公冶长第五	(96)
雍也第六	(109)
论语卷之四	(121)
述而第七	(121)
泰伯第八	(134)
论语卷之五	(143)
子罕第九	(143)
乡党第十	(157)
论语卷之六	(167)
先进第十一	(167)
颜渊第十二	(180)
论语卷之七	(191)
子路第十三	(191)
宪问第十四	(202)

论语卷之八	(221)
卫灵公第十五	(221)
季氏第十六	(237)
论语卷之九	(245)
阳货第十七	(245)
微子第十八	(258)
论语卷之十	(264)
子张第十九	(264)
尧曰第二十	(274)
 孟子卷之一	(277)
梁惠王章句上	(277)
梁惠王章句下	(294)
孟子卷之二	(315)
公孙丑章句上	(315)
公孙丑章句下	(336)
孟子卷之三	(355)
滕文公章句上	(355)
滕文公章句下	(373)
孟子卷之四	(391)
离娄章句上	(391)
离娄章句下	(412)
孟子卷之五	(432)
万章章句上	(432)
万章章句下	(448)
孟子卷之六	(462)
告子章句上	(462)
告子章句下	(479)
孟子卷之七	(495)
尽心章句上	(495)
尽心章句下	(518)
 主要参考书目	(540)

大学^[1]

子程子曰^[2]：“《大学》，孔氏之遗书^[3]，而初学入德之门也^[4]。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5]，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6]。”

注释

[1]《大学》：本为《礼记》的一篇，写成于战国秦汉之际。唐宋时受到韩愈、司马光等人的重视，程颢、程颐认为原本《大学》失次，各有《改正〈大学〉》，并且认为：“《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颢语，《程氏遗书》卷二上）“《大学》，圣人之完书也。”（程颐语，《程氏遗书》卷二十四）“唐棣问：‘初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程颐语，《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大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提出了三纲领〔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集中表达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可以用孔子“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来概括其中心思想。朱熹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一》）他反复强调：“学问须以《大学》为先”，“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同上）。本书评语有对朱熹解说的批评，有对后儒清论玄微的批评，对《大学》则推崇说：“世间种种学问无不包括，后来种种病痛无不扫除，真圣人之文也。”“《大学》一书，平天下之底本也。”关于“大学”二字的含义，郑玄曰：“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孔颖达曰：“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意为博学、学成可以治国平天下，并非朱熹所说与“小学”相对的“大学”。

[2]子程子：指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程子的“子”，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美称，如孔子、孟子。前一个“子”，是对老师的尊称。朱熹从学于李侗，李侗从学于罗从彦，罗从彦从学于杨时，杨时从学于程颢、程颐，朱熹是二程

的四传弟子，所以这样称呼二程。二程是北宋哲学家，都是理学创立者之一。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河南洛阳人。二人同受业于周敦颐。他们都强调“理”、“天理”。“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者理也”，“理与心一”，“心是理，理是心”（程颐）；“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程颐）。二程的学说为朱熹所继承发展，形成程朱学派，对后人有很大影响。《二程全书》即今之点校本《二程集》。《宋史》卷四二七有二程传。下面所引关于《大学》的话，是朱熹综合二程的论述作为《大学》的小序。

〔3〕孔氏：指孔子。

〔4〕入德：进德。

〔5〕次第：顺序。

〔6〕庶乎：大概，或许。语气是揣测、估计性的，意思则是肯定的。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4〕}。（眉批^{〔5〕}：三纲领中，止至善为要，故又抽出言之。）

知止而后有定^{〔6〕}，定而后能静^{〔7〕}，静而后能安^{〔8〕}，安而后能虑^{〔9〕}，虑而后能得^{〔10〕}。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11〕}，则近道矣^{〔12〕}。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13〕}，先治其国^{〔14〕}；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15〕}；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16〕}；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17〕}；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18〕}；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19〕}。致知在格物^{〔20〕}。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1〕}（眉批：八条目中修身为要，故又抽出言之。）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2〕}。其本乱而末治者^{〔23〕}，否矣^{〔24〕}。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25〕}，未之有也。

右经一章^{〔26〕}，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27〕}。其传十章^{〔28〕}，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29〕}。

〔评〕^{〔30〕}文字极有条理，极有格式。三纲领处，鸳鸯画出^{〔31〕}；八条目处，金针度人也^{〔32〕}。世间种种学问无不包括，后来种种病痛无不扫除，真圣人之文也。

注释

〔1〕道：宗旨，原则。

〔2〕明明德：使光明的德性彰显起来。明，使之明，光大，彰明。明德，贤明的德性。

〔3〕亲民：即“仁民”，对民亲爱。下文“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即此意。程颐以为“亲”当作“新”，新民，意为人们“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朱熹注）。此说与下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相应。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出土大量竹简，凡“亲”字都写作“新”，可知亲、新通用。程说有据。

〔4〕止于至善：（使明明德、新民）达到最完美的境界。至，极，最。朱熹以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者为大学之纲领，而止于至善又是明明德、新民的“标的”、“极至处”（《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一·纲领》）。

〔5〕本书将原眉批移于文中，并加“眉批”二字。

〔6〕“知止”句：知道了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然后才有确定的志向。止，所达到的地方，即“至善”之境。

〔7〕静：内心宁静。朱熹注：“谓心不妄动。”

〔8〕安：随遇而安。朱熹注：“谓所处而安。”

〔9〕虑：思虑。朱熹注：“谓处事精详。”

〔10〕得：获得，得到至善的境界。“知止”至“能得”一节是说如何达到至善的境界。

〔11〕知所先后：懂得把握道德修养的先后主次顺序。

〔12〕朱熹注：“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

〔13〕明明德于天下：在普天下彰显贤明的德性，即平治天下。朱熹注：“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14〕国：这里指诸侯国。

〔15〕齐：整齐，整治好。

〔16〕修其身：修养好自身的品德。

〔17〕正其心：端正自己的内心，使之正而不邪。

〔18〕诚其意：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朱熹注：“意者，心之所发也。”

〔19〕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致，取得。

〔20〕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穷究，推究。以上即八条目，从平天下逆推至格物。朱熹曰：“此（‘古之欲明’至此）言大学之序，其详如此，盖纲领之条目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新民之

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

〔21〕这一节是顺推八条目的效验。其中修身是关键。“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朱熹注）

〔22〕壹：一概，都。 本：根本。

〔23〕本：指修身。 末：与“本”相对。朱熹曰：“修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凡前面许多事，便是理会修身。”（《朱子语类》卷十五《大学二·经下》）

〔24〕否：无。王引之释此曰：“言事所必无也。”（《经传释词》卷十）

〔25〕“其所”二句：对他应当重视的反而轻视，对他应当轻视的反而重视。厚，重，注重。朱熹注：“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

〔26〕此下一段是朱熹的说明，朱熹认为上面一段是“经”，是“孔子之言”，下面各章是“传”，是“曾子之意”。《大学》原本并无经、传之分，分出经，表明程、朱对《大学》的重视和强调。

〔27〕曾子（公元前505～前436）：曾参，孔子弟子，字子舆，南武城（今属山东平邑）人。重修身，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以孝著称。宋儒认为曾子能传孔子之道。

〔28〕传（zhuàn）：与“经”相对，解经的文字叫传。

〔29〕如左：犹言“如下”，古籍直书，自右至左，故曰“如左”。

〔30〕以下是评文。原无“评”字，为使眉目清楚，本书亦如眉批之例加一“评”字，下同。

〔31〕鸳鸯画出：朱熹注：“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朱子语类·大学二》又说：“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则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则虽有彼此之间，其为欲明之德，则彼此无不同也。”先后、本末，始终并提，出双入对，即所谓“鸳鸯画出”。

〔32〕金针度人：意谓把秘法、诀窍传授给别人。金针，即缝补刺绣的针。唐冯翊子《桂苑丛谈·史遗》载，郑侃之女采娘七夕祭织女乞巧，织女送给她一枚金针，此后采娘的刺绣技艺大进。后以金针喻指秘法、诀窍。度，授予。

《康诰》曰^{〔1〕}：“克明德^{〔2〕}。”《大甲》曰^{〔3〕}：“顾谟天之明命^{〔4〕}。”《帝典》曰^{〔5〕}：“克明峻德^{〔6〕}。”皆自明也^{〔7〕}。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

〔评〕逆溯而上，见“在明明德”之语，非孔夫子创言也^{〔8〕}。

注释

〔1〕《康诰》：《尚书》中的篇名，是周公对其弟康叔受封殷地时的告诫文。